

## 中国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

郑 新培

###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Migrant Laborer's Children in China

Teh Sin Puay

#### 概 要

経済改革開放により、中国全国経済に発展のアンバランスが生じ、沿海部・中部と西部の経済格差が日増しに突出していった。1980年代末から、中・西部貧困地帯の農民は大量に都市へ出稼ぎに行った。現在、農村余剰労働力は1億人以上と言われ、彼らは都市へ流れて行き、“民工”（出稼ぎ労働者）として働いている。その一部は長期滞在のため子供も呼び寄せることになる。中国の現行固定戸籍制度の規定により、農村戸籍の人は都市戸籍に変更してはならず、子供たちは居住地の戸籍ではないため、当地の学校に入学できない。但し、個別のケースとして、労働者の平均年収2～3年分の寄付金などを納めれば入学できる者もいる。しかし結局、“民工”の手により作られた非合法の“打工子弟学校”（出稼ぎ労働者の子女の学校）に入学するしかなくなる。これらの学校は空き地や荒廃した建物を借りて教育の場として使用している。彼らは政府からの援助なしに自力で学校を運営している。

民工たちは経済発展に貢献し、税金を当地に納め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子女は義務教育の権利を与えられない。2001年4月から、私は北京大学で研究員として滞在した半年間、出稼ぎ労働者の子女教育問題を研究し、学校へ調査に

も出かけた。出稼ぎ労働者の子女教育問題と実態をここで検証したいと思う。

## 目 次

- 一、前言
- 二、打工子弟学校产生的背景
  - 1. 经济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 2. 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增收困难
  - 3. 民工子弟教育问题
- 三、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 1. 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情况
  - 2. 义务教育与经费问题
- 四、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
  - 1. 各地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闭
  - 2. 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特色
- 五、结语

## 一、前言

中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除了政治制度以外，各个领域都一步步地沿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原理进行改革，甚至比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各方面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思想意识领域方面，尽管政府怎么说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体系和先富后富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包括官僚在内的大多数人民，似乎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只知道赚钱、发富、自我实现价值；豪车、美女、别墅、豪游、奢赌已成为人人最大的追求目标。人生的最高境界被人们尊崇为“向钱看”，谁都认为“有钱就有一切”，“有钱也能买权”。

“钱”“权”交响曲，天天都在神州大地奏响。而“经济效益”是一切的主题曲。

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教育上，最明显不过的是站在教育最前线的教师，除了少数外，我所调查的以及所看到的资料，大多数教师教育学生要如何实现“自我

价值”，这“价值”就是说“如何赚多钱”，用钱衡量“自己的价值”。天真的小孩子纯洁的青少年都把“大款”当明星学，老师也认为唯其如此，这孩子才有“出息”，才能“出人头地”。因此，“好学校”，“重点学校”便成为通向“钱程”的必经之道。而那些非重点的普通学校尤其是软·硬件都差的乡村学校便被人们遗弃荒郊。更何况是被挤在社会边缘的民工子弟窝棚学校。不过，按“钱程”设计的一些被称为“贵族学校”的“民办学校”却颇受青睐，尽管它的铺路钱太贵，但它还能通过“电脑”和“英语”双轨道，把这些“先富起来”的子弟送往太平洋彼岸。有望将来在海外建立“金钱王国”。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地深化，教育也按着“经济效益”的规律被推向市场。教育成为商场，按上中下三等区分，依次为重点和贵族学校，普通学校和差校以及非法或半合法打工子弟学校。进入这三种学校的人纯视其家庭背景和经济强弱而定，即富裕·权贵者、一般平民、底层劳工和农民工三类子女按上列顺序入学。处于城镇边缘弱势的底层劳工，尤其是离乡进城的民工子女，他们就连普通的公立学校也进不了，只有那些被认为非法或半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打开大门迎接他们，为他们提供被认为不够教育标准的教育。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劳动阶层的子女无法获得正规教育的机会呢？在此我们将作探讨研究。

## 二、打工子弟学校产生的背景

### 1、经济发展与社会阶层分化

1978年宣布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不断地流入中国。国营企业不是破产倒闭的就是私有化或改为国有企业，以沿海东部为中心的地区和城镇区域的经济迅速发展。二十多年来，平均每年的GNP都以7~8%以上增长，去年GNP总额已达10万亿元。国民GNP平均每人约为85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但是，这也只相当于日本人均GNP的3%左右。而且还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小康社会，各地区、各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据国家统计局，目前还有近3000万人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问题，城镇贫困人数在2001年还有1400万人左右，至于那1亿以上的流动民工生活水平，其贫困标准则无法估计。不过他们的月入平均介在400~800元。全国还有2000多个县居于温饱线下。而像上海、深圳那样

的发达城市已达 GDP 人均4000美元(1), 是贫困省—贵州省的十倍。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加上客观条件的制约, 以及人为的经济操作, 中国社会开始呈现出阶级的分化。资本家、富裕阶层(包括高薪阶层)、平民和贱民(包括贫困山村的农民)已经逐渐形成鲜明的对照。去年政府统计中国居民存款已达6万多亿元, 看来人民富裕有余, 实际上这只是为10%~15%的人所占有(2), 广大的民众只能“望钱兴叹”。为了寻求温饱、早日脱贫, 1亿左右的贫困农民流向城镇打工, 主要是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为主。在城镇打工的农民, 由于半个多世纪来实行城乡户籍分离治之政策使然, 形成城乡二个截然不同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人看不起农民, 他们被视为城市边缘的平民或贱民, 享受不到跟城市人一样的教育、权利和福利, 并常遭到白眼和践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校门八字开, 无钱莫进来”。农村户籍的民工子女交不上几千几万元的“借读费”、“赞助费”、“转校费”就进不了城镇的校门, 而那些富裕阶层的人却可用钱来铺桥进校。因为这是“教育市场经济”起作用, 学校已非净土了, 谁还能高唱“劳动人民是国家主人翁”的被认为已过时的调子呢? 三年多前在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遇难者, 当地政府便以农民是农村户口为由, 只发给死难家属2万2000元慰藉费, 而有城镇户口的则补偿4万8000元。谁敢想像就是因为是农村户籍, 农民(民工)的一条命还不值城市人的一半, 这不是贱民是什么? 河南省某县的一个派出所警察, 严刑拷打一个农民时, 农民诉说这是违法行为, 要告状他, 他却说:“我什么人都怕, 就不怕你们农民!”(3)。

尽管如此, 农民还是不断地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从表1. 可以看出从1978~2000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平均高过农村居民的2~3倍左右。实际上, 城市人加上养老金、福利、医疗等津贴, 却高过无此恩惠的农民的5~6倍以上; 而像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居民的收入更高过一些贫困区村民的8~9倍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虽然从1978年的2亿5166万人减至2000年的3133万人, 仍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8%。为什么农民非进城寻活不可呢? 我们再从下述一些事实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表 1 中国贫困人口状况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133.6	196.3	397.6	686.3	1577.7	2253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343.4	477.6	739.1	1510.2	4283	6280
农村贫困人口(万)	25166	32463	11944	10324	6240	3133
全国贫困人口(万)		35192	14805	11501	8834	459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2、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增收困难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经历了几个阶段。八十年上中期，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分田自耕，多劳多得，一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经济日益发展，并把社办企业改造为乡镇企业，农民收入大增，万元户(年收入1万元以上农户)不断涌现。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前期，有些农民靠智慧勇气和微薄资金，到城镇发展制造业，接受外资来料加工，参与物资流通等商贸活动，发了财的也大有人在。此时城市开始进行工商业改造，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或推行承包制，全面推向自由市场，以经济效益为主导。同时，外资外商以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大量流入，农民面对这种内外夹攻，显然已无招架之力了。特别是乡镇企业开始在外来技术的冲击下，粗制产品难以竞争，乡镇企业相继倒产或停顿。面对新技术、新知识，农民又因受教育不高(平均只有3~4年教育的水平)，资金有限，不但在商场上节节败退，即使想到企业机构工作，也因学历过低知识贫乏，难以胜任初、中级技能工作，只好靠体力卖命，挣得一点在日本被称为“三K”(即肮脏、劳累、危险)的低微工资来养家糊口。

中国农民人口现有8亿多。可耕地每人仅有1~2亩，有的地方人均耕地还不足1亩。剩余劳动力又因文化水平低，分流不出去，收入难以增加。再加上自由市场的冲击，农产品价格得不到政府的有效调控，收入不稳定。而政府对于革新农业技术，种田科学化等的支农开支占财政总支出不足10%。各级政府一般都把财政支出放在城镇建设、交通设备等经济效益高的领域上，热衷于搞城镇基建以便引进外资，提高个人单位“政绩工程”，忽略了农业是安邦治国之本。我到中国农村去调研时，看到大片大片的耕地野草丛生，没有种上任何作物，真不知说

什么好。过去农民为没有土地而揭竿起义，如今却荒废无人耕种。但听农民反映说，若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一个月收入平均不到200元。若外出打工，起码也有2~3倍，甚至5倍的收入。这样就算是花去买粮食买菜的钱，也还是有所剩余，否则不仅吃不饱，孩子也别想上学了。显然农民是被迫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挣钱的。该村里15岁到50岁的男子，15岁以上未婚的女子，有80%以上到各大城市去打工，带着孩子出去也有好几户。留在村里的多为老弱病残者，难怪无人耕地。

### 3、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随着民工的大量进城打工，由于工作的性质，有的人流动性不大，有的流动比较大。流动不太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把留在家乡的子女接到身边来，一圆天伦之乐，二好亲自管教孩子，三可免除孩子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孤独心情。这些人中，有固定正式职业者，有一定技术能力者，有自个儿摆摊做小买卖者，也有较长期地在某公司商店打工者。还有因老家没有长辈亲人代看孩子的，更有的认为乡下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希望让孩子在城市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以图孩子将来有个好的前途。

据统计，目前中国各地流动人口总数约有8000多万，也有报告说1亿多，按学龄儿童少年占2~3%推算，大约有200多万人(4)。在广东省的流动人口约有1100多万，武汉市有150万，浙江省有600多万人，上海市有380多万人，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福建省有200多万人。北京市有320多万，学龄儿童少年约有10万3千多(5)。

1990年代中期开始，民工的子女不断地流入城镇，可是他们却面对无学可上的问题。首先是户籍问题，非本籍人进不了当地的公立学校。二是即使有些空位可接受的，却被索取数千或万元以上的“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等，让他们却步不前。三是虽有私立学校，又因多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土豪富绅”，“少爷小姐”而办，无钱只好望洋兴叹。这样，这些正值学龄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龄学年的孩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去，而自己却站在校门外让人睥睨着。结果，这200多万的苦命儿，有幸的进了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幸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要吗父母铁下心肠，把孩子送回老家，在原籍地入学。一是

要吗让孩子失学，流落街头。在首都北京等城镇街头，时常能见到学龄儿童少年流浪乞食，或做孩子不该做的工。我曾在某校调研时，问过一、两个青少年对沦落街头上的孩子的看法。他们回答说：“谁叫他们命不好！”明快干脆，却让我哑口无言。“谁叫他们命不好！”这“命”是谁定的？

为此，有一部分惺惺惜惺惺的民工，虽然学识不很高，但他们不愿看到这些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却被国家排除出义务教育的民工子弟，再走父母没有文化的痛苦的人生道路，义不容辞地在力不从心下学习陶行知先生(6)的创办平民教育的精神，办起了打工子弟学校，为那些走投无路的被社会遗弃的民工子弟创造了人间乐园，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九十年代后半期，打工子弟学校就在各大城市的边缘角落苦苦地支撑起来，单是在上海就有500多所，北京也有300多所，全国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资料可查。若以北京300多万民工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来推算，那么全国1亿多民工就有1万所打工子弟学校吧。显然对民工子弟来说，虽然这些破椅陋房完全不能跟那些富丽堂皇的“公立学校”和“贵族学校”相比，但它却给他们送来了温暖的书香，人间的真情。一个在打工子弟学校学习的孩子，在回答记者问他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时，他说：“长大以后，我要赚钱，为劳工子弟建很多学校，让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小朋友来学习”(7)。这是多么感人的肺腑之言！

### 三、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 1、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情况

中国自1949年以后，不可否认的在教育上做了极大的努力，为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制定了一连串的教育政策，力求尽快消除文盲，经过了半世纪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盲率从1949年的80%降到1998年14.5%（见表2）。

表2 文盲变化情况

率 份	1949	1964	1982	1990	1995	1998	2000
文盲数量(亿)	3.20	2.33	2.35	1.82	1.45	1.35	0.85
文盲率 (%)	80	57.3	34.5	22.2	16.5	14.5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50年》北京师大出版 290页

2000年15~50岁青壮年的文盲率为4.8%、约2000万人。至2001年,在农村通过各种类型的教育方式,使农民的文盲率下降到8%,9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0%(8)。但是,实际上,官方报告,往往水份掺入不少,还要打一些折扣。据知不少地方政府,一些官员为保乌纱帽,表现“政绩”,在调查义务教育达标时,安排标准班或从邻村调来合标准的学生充数,蒙骗过关。假报告假数字比比皆是。

但是就按目前公布的数字来看,我们却从每年辍学人数中(这也可能掺入水份)发现到新文盲人数反比扫除掉的文盲人数多一倍。1949年至1996年,47年累计扫盲人数为2.2亿左右,可是由于中小学生辍学而成为新文盲或半文盲人数竟达4亿之多(9)。目前农村有1亿到1亿5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恰好是新旧文盲或半文盲的主力军,他们大批的流向城镇,希望寻求一份工作,以便能安家,补助家庭,脱离贫困。在城镇等待他们的虽是三K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可是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兄弟姐妹,明知山有虎仍往虎山行。他们进城从事三K工作,一是因为户籍限制,二是因为文化学历所限。民工之中,小学和初中毕业占主流地位,高中和大专也有一小部份。由于他们教育的背景,一般都从事建筑业、工业、服务业、饮食业等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通常都在10~12小时,平均一个月工资为400~800元。由于收入低微,加上城镇生活费高昂,他们只能屈栖在没有什么基础设施的城镇边缘。加上城镇市民对他们的警戒和歧视,他们一般都聚集而居,互相支撑,甚至还形成被称为“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安徽村”等民工村落。

问题是这支庞大的民工所带来的200多万学龄儿童少年,如果不能让他们上学,新一代文盲候补大军又要上来了,这显然是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更可怕的是社会分化,阶级对立必将日益恶化。

## 2、义务教育与经费问题

1985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因地制宜地推行教育体制改革,争取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1986年公布了《义务教育法》,实行“免收学费和助学金制度”。基础教育下放为地方政府举办的事业,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农村实行



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同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基础教育。目的是想调动全民社会力量来共同发展基础教育，实现“两基”目标。

在《义务教育法》里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义务送孩子入学”。第四条特别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显然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教育壮举。在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确实是向前跨进了一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基石。

可是，“由于在《决定》中未对‘地方政府’作出明确界定，加之我国实行的是五级政府，四级财政，从中央到地方，除了最低一级的乡政府，几乎每一级上级政府都有自己的下一级政府，而上级政府为了减轻自身负担，又层层缩小‘地方’范围，层层转嫁责任。……这样一来，最基层的没有办法再分割的乡政府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地方政府，被迫承担起所辖地区的义务教育之责。……乡镇成了义务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10）。据谢秀英文章说，县乡两级占义务教育投入总量的80%，中央拨款只占2%。结果，经济薄弱或贫困乡村，单是为了筹集教育事业费都负债累累，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而且还是一年两年的累积拖欠（11）。至于教育设备、危房改建等公用事业投入完全顾不上了。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村里的义务教育经费，实际上都落在本已贫困的农民身上。校长为了补足经费，开出似是而非的诸多收费名目，加重农民的负担。更荒唐的是河南虞城县沙集小学的党委、政府。竟向分配到该小学任教的贺红峰提出要缴纳1.1万元才能上岗，而且第一年月资只有100元，第二年才发290元标准工资。理由是乡财政困难，如果因此上访就永远不准上岗。贺氏早已因上大专三年而负债1.5万元，如何能再平白无故地逼他缴纳什么“上岗费”呢？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800元，财政困难尚可理解，但哪有如此收费法呢（12）？教育法里哪有“上岗费”这一条呢？

由于农村所存在的客观条件制约的困难，如果不加以支援和全力改造，农民又无科技知识来改变环境，靠天吃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此，只有流外到城镇求生，这是客观因素存在，也是至今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结果。在政府彻底转变

政策的过渡时期，应该正视民工实际困境，为他们排除忧虑，解决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包袱，或当另类看待。义务教育应由中央政府负责，而不该交由地方政府任意“看着办”。

从中国回来的日本孤儿子女，还有中国留日学生的子女，他们上日本学校学习时，日本政府或学校并没有把他们当外人或外国人而拒之千里，而是热情教育悉心关照，与日本学生一视同仁。不但没有收什么“择校费”、“借读费”、“赞助费”，还尽量为他们寻找会中文的老师来辅导，当然这也不收费的。法国还挨家挨户去把非法移民的孩子找来，让他们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那么中国地方政府或学校为什么自己违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总想用各种方法去剥夺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呢？就是连民工自己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也不让存在，总以不符合教育规定标准来关闭它们，这不是明显地把他们推出校门，剥夺义务法所规定的应受教育的权利吗？中国革命时期的解放区学校有哪一所是“正规”的？符合教育规定的标准呢？下面我举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来说明一下，这类学校实在应该得到保护和支援，而不是以“不符合教育标准”来把它们关闭。我在调查时发现，其实他们都尽量按教育法办学，并且在没有任何人支援下，为协助国家的义务教育而献身呢。

#### 四、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

##### 1. 各地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闭

最近几年，由于民工子女进城日益增多，打工子弟学校也随着不断增加。全国各地的政府对这些学校都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中央政府在1998年3月制定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主要归居住地管理”，“允许公民个人设立专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开办简易学校”。可以说正式承认民工子弟可随父母在任职地上学。为此，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制定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许多自办学校也走上了规范办学的道路，虽然还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正规办学标准。

2001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

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说，“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一管理。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可适当放宽，但应消除卫生、安全等隐患，教师要取得相应任职资格”。

既然中央已明白地指出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并呼吁要给予扶持，为何有些地方政府却反而下令要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理由不外有以下几个：

#### （1）办学规定过细，打工子弟学校难获批准

北京各区制定的民工办学规则过细过高，许多学校按法申请都被施延多年也难批准下来。相反地，这两、三年有不少已经开办的学校接到关闭的通知。如北京丰台区于今年2月关闭310多所，受影响的学生达到4000多人。上海几百所学校也于今年接到关闭的通知，理由皆以不符合办学规则。

#### （2）教师资格不够格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因经费短缺、办学条件很差，有资格的老师又不愿上岗。现有的老师大都是农民出身，或民办教师，资历经历还不够，这是事实。但政府可协助派遣够格教师，或进行师资培训来解决。

#### （3）危房作教室，安全有问题

这也是事实。但不少学校都尽量修改危房，力求接近安全标准，由于资金所限，政府应作补助，就可迎刃而解。

#### （4）教学设备不足

民工子弟学校一般每生每学期只收3~400元，除去维持教师工资和必要开支外，充实教学设备就无多余之款了，当然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比。然而只要教师、校方下功夫搞好教学，也非不可弥补不足之处。我调研过几个山村公立小学，它们的教学设备还不如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呢。

#### （5）观念上歧视农民

一般城市人看不起农民工。认为一旦让民工子弟扎下根来，农民工就不回乡了，有碍城市发展和破坏市容；执政者认为有碍其政绩，有碍社会治安。显然是把农民工当作“洪水猛兽”。

## 2、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特色

实质上，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里不妨举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来分析。它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所收容打工子弟的学校，各方面都还是可以的，但至今仍未被承认。笔者年前曾走访该校，并同易校长李副校长深谈，校长还提供有关该校的办学情况。下面就根据谈话的记录以及所提供的资料作简介，从而可以看出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情况和特色(13)。

(1) 学校的概况—位于北京海淀区五路居村，校舍是租赁的，租金一年49万多元，占地面积4000m<sup>2</sup>，建筑面积1800m<sup>2</sup>，周边还有三个分校。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办学，开设学前、小学、初中课程。在校生1976人，其中初中156人，小学1588人，学前班232人。学生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7个民族。专职教师106个人，大专程度62人，高级教师18人，兼职教师9人。后勤职工26人。学校自1994年9月创办以后，曾被迫三易校址，四处漂泊。如今立校之地，也非长居久安。

(2) 创办过程—李素梅副校长原为河南农村民办教师，来京打工后，民工要求她为无校可上的孩子补课。1994年她开始接受9个孩子学习，家长每月凑给40元生活费。95年学生增至50多人，一个人难以应付，她动员丈夫易本耀校长从河南老家上京协助。为了不让民工子弟失学和骨肉分离，为了那些因交不起所谓教育资源补偿金而失学的孩子，他们毅然决然地办起了“行知学校”，以陶行知先生的为平民办学的精神来为平民百姓孩子的教育而努力奋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经过7年的艰辛经营，至2001年9月，学生人数多达1976名。

(3) 运作状况—考虑到民工的收入，小学生、幼儿园每学期收300元学杂费，初中生收600元。孤儿、单亲家庭儿童、残疾儿童、特困生、重灾区儿童、教职工子女等六类学生可免费入学。这种经费本已拮据的民工子弟的学校，还会怜悯六类困难生，予以免费就学，而校舍富丽堂皇、政府全力支持的公立学校，竟对贫困打工子弟的入学索取高额的什么“教育资源补偿金”“赞助费”等，到底教育为谁服务呢？

(4) 教工待遇—教师每月工资只有500~1200元不等。(公立学校为1400元加上各种福利补贴)单身者供宿舍，夫妇提供一房。

近年来，稍微有余银，就投入教学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北京师范大学等一些

大学还把她们作为教学基地，可见其各方面条件还是可以的。但据易校长说：教育官员虽有常来视察，对其办学认可问题，至今还没作出表态，但赞赏她们办学的可贵精神。然而易校长说：“我们并非想永久经营‘民工子弟学校’、而只是为那些被拒在公立校门之外无学可上的民工子女办学，免受失学流浪街头之苦，让他们也能获得义务教育的机会。因此、我们只希望政府能尽快确立政策，让打工子弟都能进入公立学校，同北京市民的孩子一样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那么，我们也就完成了使命”。

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都是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为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政府应该加以鼓励和支援，而不是予以取缔，除非政府能把200多万的民工子女都纳入当地公立学校。

## 五、结语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教育现象。国家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只把眼光放在城市里，对广大的农村似乎视而不见。从建国至今，不管教育政策如何变更，几乎都把农民子弟教育排除在外，多按城市居民的要求立案，造成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当我们看到教育统计数字时，总是误认中国全民教育都处于相同状态。比如说，按国家统计局1993年每一万人之中就有139个大专生。实际上，像西藏、贵州、云南等省只有这个平均数的30~50%而已，上海、北京都比这个平均数大4~5倍。我的乡村，除了侨属子弟外，到八十年代还没出个大专生。

目前8500多万的文盲人数中，80~90%为农民。农民是中国收入最低、最贫困的阶层(14)。农民的收入平均只有城市的三分之一或更低(见表1)，有的贫困山村的人均收入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这样，贫困的孩子，因为交不上巧立名目的各种学杂费，只好不上学或辍学。结果扑灭文盲工作是治标不治本、功败垂成。如今在全国7亿多的就业人口之中，文盲仍占1亿多，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还达不到日本的一半。显然，普及和提高教育水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要真正实现9年义务教育，应该在中央和省级统筹下，实行不收费强迫义务教育，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200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16386亿元，中央财政

占其 52.4%、达 8583 亿元。但，中央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只有 458 亿元。而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 339 亿元，比例是 12 比 88，但中央却掌握财政总和的 50~60%。可见中央把义务教育重担推给地方是阻碍教育的发展。

在强迫性的义务教育政策下，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城市的基建、各行各业都已少不了民工。如果像对待民工子女一样非迫他们回乡读书不可的话，那么把 1 亿流动民工都迫他们还乡的话，城镇立即陷入瘫痪、经济陷于恐慌。既然城镇需要民工为他们服务，而民工也向城镇政府纳税，为什么连子女带在身边也不可以呢？连上学（何况是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许可呢？就是按“经济效益”来看，这群孩子还是一大消费者呢，对城镇的经济发展也起着客观的有利作用。

既然需要民工在城镇打工，并且要他们纳税，就没有理由借口“户籍”问题而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排除在外。要说没有多余的教师、校舍来容纳，那么用他们纳税的钱，以及他们在城镇建设中所带来的财政收益，应该是够为他们建校办学吧。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成了城乡两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群体。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农民无权无钱无知识无地位，一直被视为贱民，认为农民进城会打乱他们的生活，威胁他们的权位。这种错误的歧视同胞的观念，一日不除的话，坐在城镇里制定政策就不会把农民的权益放在心里。他们总把农民的落后，归罪于农民的愚昧、无知。但是他们却没有去想一想到底是谁造成农民处在如此愚昧、无知的悲惨境地？如果把城市人和农村人来个对调，而且按目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教育制度来执行的话，10年20年后，农民就会像今天的城市人一样会嘲笑城市人落后、愚昧和无知了。

可见不平等的社会权利政策、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形成了对农民不公的社会。只有彻底修正这种不公的政策，才能根本的解放生产力，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无知。

在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致力于消灭国民的文盲，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无论是城镇山村，都按国家教育标准进行建校施教，城乡教育水平都保持一致，教师、设备、经费全都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重点学校、普通学校、差校之分。因此，日本在短期内实现了全民义务教育，全民达到最低起跑线的教育水平，从而

促使日本经济的起飞，迅速成为一个强国。中国应该借鉴日本，而不应以“国情不同”、“经费不足”、“中国特色的教育”等借口来安于现状。应该说号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国情，不会输给“没有资源、人多地震多火山多”的日本国情吧。

中国有人统计，按目前中国每年贪污舞弊、官僚吃喝玩乐、国有资产流失等所耗费的国家款项，完全可以解决义务教育的所有经费，根本不需要发动什么“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何况区区的200万民工子弟哪会没有好学校可上呢。

### 注释

- 1、「中国离全面小康还有多远？」香港《文汇报》2002年12月9日
- 2、柏岳主编《中国教育现状沉思录》山东友谊出版 2002年5月 12页
- 3、徐润「有关农民」《读者》2002年6月 2号
- 4、王淑军「他们也有上学的权利」《人民日报》2001年8月10日
- 5、《人民日报》2002年6月20日《东方时报》2002年5月22日
- 6、陶行知(1891·10~1946·7)安徽黄山市人。中国现代伟大的平民教育家。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受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的影响。1916年回国后，曾任南京高师教授。后来他从中国实际情况，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观点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提唱平民教育，深入广大工农生活区域去办学，主张普及农民教育。他认为“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而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陶行知文集》第一卷101页）1923年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毕生从事于平民教育运动，影响巨大。
- 7、鲁忠民「北京共稼ぎ労働者の子らにも教育の光か」《人民中国》2002年 6月号
- 8、农业部长杜青林报告《新华月报》2002年第11期 81页。
- 9、李季《中国教育病》四川教育出版 1999年5月 66页
- 10、谢秀英「我国义务教育财政问题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1月号

- 11、据《人民日报》2001、8、7报道，截止2000年底，安徽全省累计欠发教师工资为8.3亿元，涉及2/3的县市。
- 12、胡震杰「教师先交费才能上岗」《民主与法制》 2002年6月
- 13、参见《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情况介绍》
- 14、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报告」《商界》2002年第2期。报告中说第九阶层为农民，第十阶层为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笔者认为这第十阶层是社会转型、经济调整的过渡时期产物，这样农民当属最低层。

#### 参考资料：

- A、杂志：《人民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民主与法制》、《读者》、《人民中国》、《新华月报》、《新华文摘》、等
- B、报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等
- C、主要书籍：
  - 1、教育部《共和国教育50年》 北京师范大学 1999、9
  - 2、柏岳《中国教育现状沉思录》山东友谊出版 2002、5
  - 3、白祖诗《中国教育的沉思录》云南教育出版 1995、5
  - 4、顾明远主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 1997、9
  - 5、《当代中国教育》 当代中国出版 1996
  - 6、王智民《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002、5
  - 7、杨谊勇《失业冲击波》 今日中国出版 1997、9
  - 8、小島麗逸、鄭新培 《中国教育の発展と矛盾》 御茶の水書房 2001、7
  - 9、中国各年度《教育事業統計年鑑》
  - 10、邬沧萍《中国经济开发区外来人口研究》华东师大出版 1996、10
  - 11、余子侠《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8
  - 12、王文亮《中国の農民はなぜ貧しいのか》光文社 2003、7